

论王念孙父子的治学特点与影响

董恩林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献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王氏父子治学特点别具一格:一在于其思想观念上的“通”,不拘泥于汉儒师说,不束缚于前贤定论,不局限于文字形体,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二在于其知识运用上的“博”,即博采经、史,旁通诸子百家,这是知识的广博;综合运用各科知识、各种手段,对古书字词加以校勘训释,乃至一字之证,博及万卷,这是手段的多样,两者使得王氏父子发现和解决问题比别人高出一筹。三是其研究方法上擅长于“音”,即比同时人和先贤更多地更科学地运用音韵学理论和方法于校勘学、训诂学事业,广泛采取“声训”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与优势。

关键词:王念孙;王引之;治学特点;清代学术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7)03-0073-05

清代扬州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扬州学派中坚,他们在经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获得学界一致认可与推崇。其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与其辩证的思想、科学的方法是分不开的。这些特点与方法,赵振铎《读书杂志弁言》、许嘉璐《经义述闻弁言》及许多学者的论著都已有所总结,但或失之太泛或失之太简。笔者通过研究王氏父子著述,感觉其治学特点:一在于其思想观念上的“通”,不拘泥于汉儒师说,不束缚于前贤定论,不局限于文字形体,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思想观念领先、通达,不因循守旧,方向正确,自然事半功倍。二在于其知识运用上的“博”,即博采经、史、子、集,旁通诸子百家,综合运用各科知识、各种手段,对古书字词加以校勘训释,乃至一字之证,博及万卷;知识的广博,手段的多样化,使得王氏父子发现和解决问题比别人高出一筹。三是其研究方法上擅长于“音”,即比同龄人和先贤更多地更科学地运用音韵学理论和方法于校勘学、训诂学事业,广泛采取“声训”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与优势,因而能够取得许多同时代人和前贤不能取得的成果。下面略加分析,以就教于同行专家。

一 思想观念上的“通”

我们先看其思想观念上的“通”。治学不尚墨守、研经实事求是,这是清代扬州学派的共同学风,而王

氏父子治学的“通”不在兼治百科的“通”,而在思想观念上的“通”和汇纳百科知识为其训诂和校勘服务方面。他们父子二人平日治学,不迷信古人,不盲从时贤,不拘泥成说,不隘守门户,求真求实,敢于创新。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中说:“其或张君误采,博考以证其失;先儒误说,参酌而寤其非。”“于所不知,盖阙如也。”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序》中引其父王念孙的话云:“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康成者矣。”并谓其父“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①这“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一语,可以说是王氏父子治学精神的典型概括。翻开王氏父子的《广雅疏证》、《经传释词》、《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纠正前人误说的例子,不胜枚举。举凡汉唐以来毛亨、郑玄、许慎、服虔、虞翻、杜预、孔颖达、朱熹等经学大师的说经成训,只要有可商榷者,王氏父子均一一辨之。试举二例,《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毛《传》曰:“言大水方方为害。”王念孙指出其误,“方”是“旁”的借字,“旁”有“普遍”之义。“汤汤洪水方割”,言洪水遍害下民也。^②《诗经·鸛羽》:“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毛《传》、郑《笺》都训“盬”为良盬之盬,盬为“不精致”之义。

收稿日期:2006-11-15

作者简介:董恩林(1956—),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和汉唐思想文化史研究。

^① 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版;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下引版本同此。

^②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第69页下。

王引之指出毛、郑之误：古代鹽、苦音同义通，鹽乃苦之借字。《尔雅》：“苦，息也。”“王事靡鹽”，是“王事无止息”之义，故下句云，小民不能播种稷黍。^①如此等等，这是王氏父子不佞古的表现。

不盲从同时代的学术权威，也是王氏父子思想通达的表现之一。江永、戴震、惠栋、段玉裁、孙星衍、卢文弨、毕沅等等乾嘉学者，与王氏父子或为师生、或为同门学友、或为学术同行，王氏父子既遍采其学术精义，亦对其学术讹谬时有驳难。如王引之在《与焦理堂先生书》中就直率地指出：“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如说《周礼》丘封之度，颠倒甚矣，他人无此谬也。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②吴派首领惠栋继承了顾炎武治学务实的学风，大力提倡由古书的文字、音韵、训诂来寻求义理，在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乾嘉学派冠绝一时的大师。然而惠氏对汉儒经说绝对尊信，唯汉是从，唯古皆好，认为“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③。由于崇古佞汉，不免拘执、盲从，出现一些失误，故受到扬州学派的批评。又如《尚书·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戴震以为“《尧典》古本必作‘横被四表’”，“横转写为桃，脱误为光。追原古初，当读古旷反，庶合充廓广远之义。”并引证《汉书·王褒传》、《汉书·王莽传》“横被无穷”、“横被四表”等。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三“光被四表”条对此加以驳正，指出：“光、桃、横古同声而通用，非转写讹脱为光也。三字皆充广之义，不必古旷反而后为充也。”“光被之光作横，又作广，字异而声义同，无烦是此而非彼也。”王氏父子敢于对这种大师级经学长辈提出批评，足见其不盲从的学风。

对于汉宋壁垒，王氏父子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真正做到“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在其父子所著四书中屡引朱熹等宋学大师的话以证其说，如《经义述闻》卷一“丧羊于易、丧牛于易”条引《朱子语类》等，皆是其证。

王氏父子的通达求实还表现在他们既不拘泥别人成说，也不固执自己的不足，这在学者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典型的例证是王念孙花费极大精力校读《淮南子》，写成近二十万字读书札记。但由于他所根据的只是《道藏》本，而没有看到宋本。等到《读书杂志》刊成，顾广圻读了之后，因从汪闳源处借来宋本《淮南子》，复校一次，又订正许多讹误，并录以示王引之。王引之谓“其心之细、识之精，实为近今所罕有，非熟于古书之体例而能以类推者，不能平允如是。”遂补刻顾广圻所校订各条于《淮南子杂志》

之后。^④这一事实，说明王氏父子对待学术研究谦虚谨慎、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专己，不守残，尽量汲取人家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也构成了王氏父子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基本条件。

二 知识运用上的“博”

乾嘉学者个个饱读四部、满腹经纶，人人能够利用不同版本、参考不同记载，校勘出古籍一般的错误，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像王氏父子那样全面运用自己所学知识，综合前人诸多校勘、训诂方法，对古籍进行校勘和训释，从而发现和纠正前人的经学误解，却并不多见。王氏父子之博，不仅有知识占有之博，更有知识运用之博、考求之博、引证之博，在王氏父子所撰四种代表作中，经常可以看到“遍考经传”、“遍考书传”、“遍考经传之文”、“考全经之例”等话语，如《经义述闻》卷七“幅陨既长”条，王引之“遍考书传，无谓地广为幅者”，又“考全《诗》之例”，指出：“凡《诗》第二字用云字者，如‘卜云其吉’、‘曷云能来’、‘曷云能来’、‘如云不克’、‘莽云不逮’之类，皆为语助。”不管王引之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其博考经传的方法与精神是可贵的。王氏父子运用广博知识所发挥的方法论作用，至少有三点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一是运用深厚的语言学素养，从语言文字规律、规范中去发现问题、纠正错误。《读书杂志》中常常出现“文不成义”、“义不相属”、“语义不完”、“义不可通”等语，这些便是王念孙根据自己深厚的语言学素养而作出的判断，然后再旁征博引，考证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如《文选》王延寿《羽猎赋》“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之为朋”一语，王念孙认为“友仁义与之为朋”一语“殊为不词，盖后人解‘与’字之义，因于‘与’下加‘之’字耳”，然后从语法与语义上指出：“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句法正相对。友，亲也；与，犹以也，言亲仁义以为朋也。”并遍引古籍论证“以”和“与”相通，再引《汉书·杨雄传》“友仁义与为朋”为实证。^⑤二是运用训诂学知识与方法，从词义、辞例和文例方面去校勘古籍，将训诂与校勘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如《史记·夏本纪》：“其土白坟，海滨广泻，厥田斥鹵，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絺。”《汉书·地理志》作：“其土白坟，海滨广泻，田上下，赋中上，贡盐絺。”没有“厥田斥鹵”四字，王念孙从分析“斥”字的意义入手，引经史训诂证明“斥”就是“泻”，不当再有“厥田斥鹵”四字；又从《禹贡》“厥”字，《史记》皆以“其”字代之的义例证之，从而断定“厥

①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第135页下。

② 载《王文简公文集》卷四，《高邮王氏遗书》本。

③ 惠栋《松崖文抄》卷1。

④ 此事本末，见王引之《补刊顾校淮南子序》及顾氏《宋本淮南鸿烈解跋》。

⑤ 《读书杂志·余编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1页。下引版本同此。

田斥鹵”四字为后人所加。^①这是从词义与辞例判断古籍讹误的例子。又如《汉书·地理志》：“宏农郡，卢氏熊耳山在东，伊水出，东北入雒。”王念孙认为：“伊水出”应为“伊水所出”，根据是《汉书》义例是凡上言某山，下言某水所出，一定有“所”字，整个《地理志》言某水所出者有八十六处，独此处及其他四处脱“所”字。某水所出如果脱一“所”字，便容易令人将其与下句连读而误解。这是从文例判断古籍失误的例子。三是运用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去发现古书在流传过程中所遭遇的凭意妄改、妄增、妄删现象，从而纠正了许多错误，甚至据此所作的许多预见都被后来的事实所证实。如赵振铎《读书杂志·弁言》中提到的王念孙凭文物知识判断《墨子·耕柱篇》“鼎有三足而方”中的“三足”当为“四足”、凭历史知识判断《荀子·君道篇》“古有万国今有数十焉”中的“数十”当为“十数”、凭古文化常识判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冉季，字子产”当作“冉季产”等等，都是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发现错误，然后广证博引而论证成案。再如《读书杂志·余编》卷上《老子》下载：

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释文：“佳，善也”；河上云：“饰也”。念孙案：善、饰二训，皆于义未安。古所谓兵者，皆指五兵而言，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若自用兵者言之，则但可谓之不祥，而不可谓之不祥之器矣。今案佳当作佳，字之误也。佳，古唯字也。唯兵为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处。上言“夫唯”，下言“故”，文义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争，故无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皆其证也。古钟鼎文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声韵》载《道德经》唯字作 据此，则今本作唯者，皆后人所改。此佳字若不误为佳，则后人亦必改为唯矣。^②

这段考证，更是从兵学常识、文字形体和全书行文通例等方面，综合比较得出来的结论。尽管没有别的本子可以对证，这论断是可以成立的。再如《读书杂志·荀子杂志·劝学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条，王念孙先从上下文义、韵脚、文例分析，认为其后应该有“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两句，然后根据褚少孙补《史记·三王世家》及索隐、《尚书·洪范》正义，指出汉唐人所见的《荀子》有此两句，又从《荀子》一书文字上多与《曾子》相类的现象入手，查到

《曾子·制言篇》有此两句，则《荀子》原本也应有此两句，遂论定今本此两句为后人误删。又如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提出的《文选》班固《东都赋》后的《白雉诗》中“嘉祥阜兮集皇都”句为后人所加，《史记·酈生陆贾列传》“继五帝三皇之业”中的“三皇”当为“三王”，《战国策·赵策》“左师触耆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中的“触耆”当为“触龙言”、“揖”当为“胥”等许多怀疑式判断，都被后来的考古新发现所证成。因此，王氏父子的校勘定论往往不能简单地用所谓“本校法”、“理校法”、“外证”、“内证”等等方法中的一种来范围，而是综合运用各科知识、各种方法，从文字、训诂、语法、音韵以及前后文气、全书义例、文化常识等各方面找线索，来证明哪些地方有错字脱文。虽无他书资证，也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其所以然，使自己提出的论断可以成立。

三 研究方法上的“声训”

创造性地科学地运用音韵学理论与方法去校勘与训释古籍，从而发现了许多前人和时贤没有发现的错误，取得了别人难以取得的学术成就。这是王氏父子经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最为辉煌的一页。清末孙诒让《籀庾述林》卷五《札遯序》中，谈到清代校书流别时，说过：“综论厥善，大氏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指，通其大例，精思博考，不参成见。其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铃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及其蔽也，则或穿穴形声，摭摭新异；凭臆改易，以是为非。乾嘉大师，唯王氏父子为精博。凡举一义，皆确凿不刊。”孙氏着重指出清代校勘家在校书工作上所掌握的钥匙，便是“以声类通转为铃键”，而“唯王氏父子为精博”。事实的确如此，王念孙总结《淮南子》各本致误的六十二条原因中有十八条是有关音韵的；徐复先生《广雅疏证·序》中总结王念孙《广雅疏证》的特色与成就六条，有五条是关乎音韵学的；据朱国理研究，《广雅疏证》仅带“转”字涉及声音关系的训诂就有410条之多。^③王氏父子对其运用音韵学理论进行校勘和训诂的特点及所取得的成就也倍加注意、倍感满足，在所著书中一再申明。如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中指出：“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引之也在《经义述闻》中多处引述、发挥其父观点。如在序中引其父的话说：“训诂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诂鞠为病矣。”又如他在各卷札记中说：“夫古字通

① 《读书杂志·史记杂志》第71页。

② 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编上》，第1010页下。

③ 朱国理《广雅疏证中的转语》，载《上海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用,存乎声音。今之学者,不求诸声而但求诸形,固宜其说之多谬也。”“故凡字之相通,皆由于声之相近。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则窒矣。”“夫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相远。”“古者声随义转,声相近者,义亦相借。”^①

王氏父子运用音韵学理论所取得的经学成就,得益于他们在经学研究中对经典文献进行了大量音韵学基础性研究,将古书旧义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用声音贯穿文字,从而发现声义相通之故,奠定其雄厚的音韵学理论基础。“当时他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以韵部为纲,依据他自己所考定的古韵二十一部的分类,将古书训诂,列成二十一表;一种是以声纽为纲,依据古声二十三母,将古书训诂,汇而释之。一九二二年,上虞罗振玉购得王氏手稿一箱,其中有《雅诂表》二十一册,《释大》二册,便是这种工作的底稿。《雅诂表》是以韵部为纲而写成的;《释大》是以声母为纲而写成的。罗氏曾委托王国维进行整理。《观堂集林》卷八有《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一篇,介绍得很清楚。《释大》虽属未完之作,已由罗氏刊入《高邮王氏遗书》中。《雅诂表》却没有印本。王国维在《叙录》中,介绍了《雅诂表》的写作体例:‘手稿无书题,取《尔雅》、《方言》、《广雅》、《小尔雅》四书诂训,以建首字为经,而以古韵二十一部分列所释之字以纬之。其建首字亦各分为二十一部,故共为二十一表。每表又分二十一格。’如《尔雅·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始为建首字,在王氏古音第十七部,故此条入第十七表。而所释之字,则元、权二字在第九部;哉、基、胎三字在第十七部;初、祖、落、舆四字在第十八部;首、叔二字在第二十部;肇字在第二十一部;故此诸字亦各分别入第九、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第二十一诸格。而权舆二字为联绵字,不可分割。则于第九格大书权字,而注舆字于其下;第十八格,则小书权字,大书舆字。其《方言》、《广雅》中诸训始之字,亦各以其部列入。如是,诸书中训始之字,三十有一,尽在一览中,而其声义相通之故,亦从可识矣。……原稿书《尔雅》以黑字,《方言》以朱字,《广雅》以绿字。然全书亦尽用此例。而所列《尔雅》诸书之字,核以原书,亦尚未尽,盖尚非写定之本也。”王国维在《叙录》中,又介绍了《释大》原稿的写作情况:“正书清稿。取字之有‘大’义者,依所隶之字母,汇而释之,并自为之注。存见、溪、群、疑、影、喻、晓七母。凡七篇,篇分上下。余从杂稿中搜得匣母一篇,草书初稿,录附卷末,并为八篇。据第四篇岸字注云:‘说见第十八篇洒字下。’又第三篇着字注云:‘物之大者,皆以牛马

称之。说见第二十三篇。’是先生此书,略已竣事。惜遗稿中,已不可见矣。按唐宋以来相传字母,凡三十有六。古音则舌头、舌上,邪齿、正齿,轻唇、重唇,并无差别,故得二十三母。先生此书,亦当有二十三篇。其前八篇,为牙、喉八母。而洒字在第十八篇,马字在第二十三篇,则此书自十五篇至十九篇,当释齿音精、清、从、心、邪五母之字;自二十篇至二十三篇,当释邦、滂、並、明四母之字。然则第九到至第十四六篇,其释来、日、端、透、定、泥六母字无疑也。今存首七篇,视全书不及三分之一。又观先生遗稿,似尚欲为《释始》、《释君》诸篇而未就者,殊不无俄空之憾。”^②

因而,王念孙能够在顾炎武、江永、戴震等音韵学家古音学基础上对古音学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自己有特色的古音韵学理论,这便是王念孙所提出来的古韵二十一部。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附载了王念孙与李方伯的一封信,内容便是王念孙向李方伯介绍自己的古音韵分部理论。顾炎武《唐韵正》分古韵为十部,江永《古韵标准》分古韵十三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分古韵为十七部,孔广森《诗声类》分古韵为十八部。与段玉裁相比,孔广森将“东”、“冬”分立二部。王念孙与段玉裁的不同之处在于将“至”从“真”部分出、“祭”从“脂”部他出、“缉”从“侵”部分立、“盍”从“谈”分立,是为二十一部。但晚年最终采纳孔广森意见,增加“冬”部,共成二十二部。《清史稿》本传载:王念孙“初从休宁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其於经,熟於汉学之门户,手编诗三百篇、九经、楚辞之韵,分古音为二十一部。於支、脂、之三部之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亦见及此,其分至、祭、盍、缉为四部,则段书所未及也。”王国维在《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中说:古音学研究“始于昆山顾君,至婺源江君、休宁戴君、金坛段君而剖析精益,至先生与曲阜孔君出,而此学乃大备。”^③王力谓:“清代古音学到王念孙,已经是登峰造极。”^④又指出:“王氏古音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至部、祭部、缉部、盍部都应该独立。”^⑤章太炎则说:“古韵学到了王念孙,已经基本上分析就绪,后人可做的只不过是修补工作。”可见,王念孙的古音学成就代表了清代古音学的最高水平,难怪其对自己的语音学成果颇感自豪。王念孙既掌握了丰富的、系统的音韵学、训诂学基本知识,从而利用它校读古书、说字解经,自然就无往而不左右逢源!

应当补充的是,王氏父子在文字学方面也是深有

① 分别见《经义述闻》第68、71、571、637页。

②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第3章第2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4—65页。

③ 载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八,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④ 王力《清代古音学》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9页。

⑤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0页。

造诣的,只因无专著问世而不为人知而已。业师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卷二》有言:“乾隆盛时,王怀祖即以深于许学名于海内。章实斋《遗书》中尝称怀祖欲发明六书精义,而苦于无暇着笔,愿得其人可授以意而能著之于书者。朱士端《强识编》卷三亦引王宽夫言,谓怀祖曾注《说文》,因段氏书成,未卒业,并以稿付之。后怀祖见段注妄改许书,不觉甚悔。据此,可知段氏为《说文注》,受其益不小,当时儒林莫不知之,且有流言散布于外。故段氏与怀祖书有云:‘《说文注》近日可成,乞为作一序。近来后进无知,咸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者,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见《经韵楼文集补编下·与王怀祖书三》)用此观之,怀祖研绎许书之功,不在段下。徒以段注已成,乃辍不复为耳。”^①

总之,王氏父子的训诂与校勘都不是现代一般人所理解的训诂与校勘,其训诂特色在因声求义,其校勘则以训诂为基础既正其文字讹误、又考其词句训释疏谬,是综合百科、博及万卷、众法兼用的活的校勘。

四 王氏父子的学术影响

王氏父子在清代学术史上有着崇高的声誉,即使在现代学术界仍然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现代凡涉国学、小学、经学研究者,无人能绕过高邮王氏父子。这从清代及近现代学者对王氏父子的评价可见一斑。清代扬州学派另一代表人物阮元誉为“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②清代晚期既是政治家又是学问家的曾国藩在《谕纪泽》信中称:“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③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在其《春在堂全书录要·群经评议》中称:“余治经以高邮王氏为宗,其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通假。”连特撰《汉学商兑》对汉学加以猛烈抨击的宋学家方东树也不得不推服王氏父子的经学成就,认为“近人说经,无过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也”。^④现代学者齐佩琳先生说:“当时治雅学者,以高邮王氏父子为最精”。^⑤周祖谟先生说:王念孙“精于校订,援引赅洽,博约简取,而又能疏通训诂,触类旁通,独造自得”。王氏“能以音为纲,‘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凡音义相通的字都比合在一起,那就能执简以驭繁,观其会通。这种方法给研究训诂的人

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途径。”^⑥殷孟伦先生说:“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著《广雅疏证》一书,是十八世纪中国语言学的重要著作之一,这部书和与之同时代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问世,标志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发展,已进入到近代语言学革命阶段,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⑦张永言先生指出:“现在我国研究汉语词源的专门著作所用的方法基本上还是清代训诂学家(以戴、段、二王为代表)的那一套。”^⑧从上述诸学者的评价中不难看出王氏父子的经学成就特别是其训诂音韵学成就具有多么大的价值。

Talking about Wang Niansun and his son's characteristic of pursuing scholarly work and influence Dong En-li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 is peculiar that Wang Niansun pursues scholarly work: The first is that its idea and thoughts is "coherent", not rigidly adhering to the teacher of Confucianism of Chinese say, not fettering on the older sage final conclusions, not being confined to the characters shap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not credible unless supported by evidence. The second is that he has a wide knowledge of the applied knowledge, in other words, is widely collect Classics and history, has a wide knowledge of various schools of thinkers, this is extension of the knowledge; Use every subject knowledge and various means synthetically, collate and train clearing up to the ancient book words, and even the card of a word, rich and volume ten thousand, this is variety of the means, the two make Wang Niansun and his son is higher than others to discovers and resolves the problem. The third is that he is good at "tone" on its research approach, that is to say, use phonology theory and method in textual criticism,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s more scientifically more than peer and sage of the past, adopt the law of "use similar sound word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a new word" extensively, thus formed his own unique research approach and advantage.

Key words: Wang Niansun; Wang Yinshi;
Characteristic of pursuing scholarly work; Academy of Qing Dynasty

(责任编辑:石磊)

① 《张舜徽集·爱晚庐随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② 阮元《研经室续集》卷2,丛书集成本。

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09通《谕纪泽》,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④ 《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⑤ 齐佩琳《训诂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3页。

⑥ 周祖谟《读王念孙广雅疏证简论》,载《周祖谟语言文字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9、354页。

⑦ 殷孟伦《王氏父子〈广雅疏证〉在汉语研究史上的地位》,《子云乡人类稿》,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215页。

⑧ 张永言《从“闻”的词义说到汉语词源学的方法问题》,《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